

■ 史象万千

## 传统影响现代转型

洪振快 历史学者

儒家重“华夷之辨”的观念,使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时,难以以开放、谦虚的心态对待外来学问和政治文明。

自近代国门被西方的枪炮轰开后,中国被迫卷入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,这一世界浪潮中。各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并不相同:有的顺利,有的坎坷。为何会这样?一个可能的解释是,现代转型的起点是传统,而各国的传统不一样,转型的基础有很大差异,命运自然也就不同。

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学者道格拉斯·诺思注意到一个现象:同是西欧国家,英国与西班牙的现代转型命运很不一样;在西欧以外,曾是英国和西班牙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,比如美国和拉美的一些国家,在现代转型中的命运也很不一样。总体来看,英国或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,相较于西班牙或曾是西班牙、葡萄牙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,现代转型要顺利得多。

历史为何如此?  
按照诺思的思想,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释:决定一个社会的运行是否良好的关键是制度;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,是一些人为设计的、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;制度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别,正式制度提供了基本社会秩序,但只是型塑人们互动关系中的一部分约束,还有大量非正式约束存在;现代转型是要建立一套符合现代要求的新制度,但这套新制度能否建立、建立之后能否运转良好,还与非正式制度有关;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观念、风俗习惯、文化传统、道德伦理、意识形态等,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族心智,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运转会起作用。

因此,虽然同是西欧国家,但英国历史上有悠久的民主宪政传统,而西班牙则是专制传统根深蒂固,所以它们在现代转型中的命运并不一样;英国的殖民地与曾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,受英国传统与西班牙传统的影响,在现代转型中表现出不一样的命运,自然也就理解了。

由此可见,传统是很重要的,绝对不能忽视。传统作为文化基因,塑造民族心智,心智构造又影响个人行为选择,而行为选择的效果又不同,所以传统会影响国家命运。

中国的现代转型相当艰难。究其原因,显然也与历史传统有关。有人说,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坎坷,是近现代中国人的问题,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老祖宗头上。这自然也有一定道理。但如果就其与传统的影响无关,则显然与事实不符。

中国古代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,其心智在整体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塑造,其思考世界的方法与行为的选择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。从这个角度看,中国近现代转型中的挫折,儒家应当承担一定历史责任,这并不是简单委过于儒家,也不是将责任推卸给古人,而只是要正视历史,实事求是,总结历史经验。

近现代西方世界的崛起,与科学技术的进步、工商业的发展、政治制度上的革命分不开。而儒家思想,恰恰在这些方面与之背道而驰。比如,儒家重视伦理纲常,鄙视科学技术,视科技为“奇技淫巧”,因此不利于科技的进步;又如,儒家重农轻商,于发展工商业不利。

在对待外来事物与其他文明方面,儒家重“华夷之辨”,以华夏为文明先进,“四夷”为野蛮落后。受这种思想影响,大清帝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,认为帝国政治制度是最文明、最先进的,而其他国家都是文明层次不如华夏的“夷”。这种观念使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时,难以以开放、谦虚的心态对待外来学问和政治文明。

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中,心智深受儒家思想塑造的帝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,即便是心态最开放的一部分人,也只是愿意承认“船坚炮利”方面不如人,再往后退最多也只能退到“中体西用”,即只是“用”(文明的器物层)方面不如人,而在“体”(文明的制度层)仍有优势,所以只需学“用”,不用学“体”。

这种观念,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,证明只学“用”不学“体”是不行的时候,在残酷的事实面前,儒家思想才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内心上否认和抛弃;到1905年科举制被取消,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获得做官的功利性目标已经完全无法达到,儒家才真正被边缘化。

钱穆认为,现代人对先人的创造物必须抱有温情和敬意。这自然是对的。但,更理性地认识中国传统对现代转型的阻力,也许更为必要。(5)



■ 遥远的工厂

## “工人”的典型画像模糊

刘洪波 资深评论人

铁锤、钢钎、车床、矿灯、脚手架……这些无论中外都曾做过工人表征的符号,现在都不再具有标记工人的意义。

工人是工厂的必要组件。这样说,符合当代的经济学逻辑。工厂是劳动要素组合的场所,工人是被组合的要素之一,这一要素被称为“劳动力”,与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一起,称为“生产力”。

“力”的概念被引入,被作为工人的定义,表明在工厂体制下,工人可以原则性地视为具备做工性能的存在。就像马力作为机械力的量度,在机械与动物之间建立了共性,工人成为“劳动力”,也就在人与机械之间建立了共性的观察视角。

工人是“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”,这不是褒扬,而是陈述。它的更准确的表达式,应该是“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”。讲“最活跃的因素”,人们对工人的理解将包括技能、知识、经验、态度、积极性等含义。这固然重要,但从基本意义来说,工人之所以是工厂的必要组件,在于他的生物特性。

工人的力量正在被机械取代,他的持久力和稳定性也不如机械。于是,在这些领域,工人退

出了,而他的操作灵敏性还不能被机械取代。倘若可以,工人在工厂里将不必要。由此可以看到,工人在工厂体制中的工具特性。

当代工厂体制的诡异之处在于,工人与机械、工具、原料等,因为都被工厂组合而构成“共同特性”,但工人之间却被分割得七零八落、面目模糊。一般性的工人概念渐近消失,而工种化的称谓在兴起。建筑工、电工、送水工、洗碗工、修理工……这些概念才是清晰的,“工人”已经很抽象了。

我们在商场里看到正在扫地的人,浮现出来的名称是“保洁员”;我们在街面上看到扫地的人,浮现出来的名称是“环卫工”。基本上,我们不会浮现出“工人”的概念,至于他们都是工人,这是需要刻意才会浮现的判断。

还有一些工人从名称上从工人群体逸出。服务行业诸多底层劳动者,都不再被划入

工人之列,现在他们叫理发师、美甲师、服装师、保安、足疗师等。

工人的典型画像模糊了,工人的一般特征也在淡化。铁锤、钢钎、车床、矿灯、脚手架、烟囱、粗壮的大手、油渍的工装、被煤灰染黑的脸……这些无论中外都曾做过工人表征的符号,现在都不再具有标记工人的意义。这些符号已经过时,新的符号如同工装一样样式丰富,分割人群。

“工人”解体了。在全球化、后现代、消费主义的时代,整体性要被分划,权利争取不再是工人运动,代之以企业内的“员工谈判能力”。

今天,“工人”作为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,一个被去除了群体性的群体,一个作为必备组件的群落,正在工厂的体制下变成碎片。(2)



新京报插图/师春雷

■ 法国大选观察

## 萨科齐押错了宝

胡艺瀚 旅法学者

萨科齐的一位亲信对笔者透露,萨科齐为了不让日渐激烈的党派内部斗争影响选情,只让极少数人参与决策。

萨科齐为自己政治生涯做出的最后挣扎结束了。5月15日的权力交接仪式结束后,他将正式变成“一介平民萨科齐”。

在过去三个月,他的确经历了一场异常艰辛和惨烈的选战。从他宣布成为总统候选人以来,谋求连任就被看做“不可完成的任务”:一来,欧债危机的深化和加剧,已经让欧洲在位的执政党岌岌可危;希腊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等国的政局已重新洗牌;二来,法国左派已失去政权17年,对右派执政效果的不满,加深了民众对“改变”的渴望;三来,法国人难以再继续忍受萨科齐高调的个人风格,他们决心把票投给“不是萨科齐的那个人”。

处在总统的位置上,谋求连任的萨科齐本来占尽竞选优势。可他却拱手让出了掌控竞选话题,并先声夺人的优势。多次民调显示,移民和治安问题并不是民众最关心的,如何促进经济增

长,解决失业和提高购买力,才是人们在候选人纲领里关注的焦点。奥朗德聪明地选择了在经济主题上做文章,提出“平等”和“增长”的概念,赢得了很高的呼声。

今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,是诚实的“民心温度计”:如果奥朗德获胜,民众更愿相信,他可能以更公平的分配方式增加购买力,至少不会比萨科齐在位的五年更糟;如果萨科齐获胜,则证明法国人对移民的恐惧和反感,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度。只是,萨科齐押错了宝。

在移民问题上,他犯了简单的错误:移民问题本来就是极右翼的“专利”,萨科齐极努力地想要往极右翼立场靠拢,不但失去了立场相对温和的中间派选民,而且任何“翻版的言论”都无法真正吸引极右翼选民。和奥朗德“团结左派”的努力相反,萨科齐的分裂倾向,让他付出了惨重代价。

在电视辩论上,萨科齐也并

没把握好最后翻盘的机会。如果萨科齐以欧洲空前的主权债务危机为立足点,牢牢抓住“国家必须减少政府赤字”这个核心,阐明政见和解决方案,结果也许会不一样。毕竟,面对空前的欧债危机,任何新总统的上台都不太可能实现立竿见影的成效。

更糟的是,这一次参与萨科齐竞选战略策划的右派人士非常少。萨科齐的一位亲信对笔者透露,萨科齐为了不让日渐激烈的党派内部斗争影响选情,只让包括比松在内的极少数人参与决策,其他人“只用抱以热情和支持就够了”。这种盲目的自信,也让萨科齐失去了相对客观和清醒的决策能力。

5月9日,萨科齐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,即将卸任的总统萨科齐为部长们签名留念,并送出最后的“离别箴言”:生活之妙在于我们知道会死去,政治之妙在于我们知道会离开。